

场经济，由政府扶持本国工业系统地替代进口，进而推动有竞争力的出口。通常的做法是，国家首先把利益表达机制结构化，特许甚至扶持若干个按照功能分化组建的经济利益集团或功能性团体，赋予它们近乎独占的政治代表权，让它们垄断主要经济领域的政策输入，从而形成法团主义的利益代理结构；然后通过这个结构引导并动员私人资本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和配合执行产业政策。同时通过干预阶级冲突和节制工会活动等方式清除不利于资本的外部性关系，以及巨额补贴出口，政经两界合力推动经济转型。

从历史上看，这种国家强于市场的政府机制只能是威权主义的。就像自由贸易在经济意识形态中被说成“自然而然”，有效的去边缘策略却是抵抗性的重商主义一样，自由民主在政治意识形态中被说成“人类历史的归宿”，有效的去边缘策略却要求威权主义，也就是由军人或准军人主政的等级化的政治体制。不必讳言，威权体制在构建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诉诸暴力，但是，威权体制能发展成为普遍性的威权主义，主要依靠的却不是暴力威慑或政治高压，而是全体国民对国民经济高增长的愿望与期待。而各类利益集团之所以甘于让渡政治话语权给军人集团，则



上图：《哥伦布首次登陆美洲》，1862年迪奥斯科罗·普埃布拉（Dioscoro Teófilo Puebla Tolín, 1831-1901）绘制。

因为它天然具备严格等级制度和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这种能力是尚在发育的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任何阶级或政党都不具备的，能在最大程度上契合国家发展主义的客观要求。

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成功地建构威权体制以推行有效的去边缘策略。成功的基础前提是，它必须在地理或心理上与霸权国家保持足够的距离。而在这方面，拉美可谓当今最不幸的地区。美国在观念上只能接受一个实行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拉美后院，这是地缘政治的基本规则在发挥作用。相对于新自由主义，美国更愿意宣称它在拉美推进地缘政治项目和采取军事行动是为当地输送民主。这是一个听起来无可辩驳的说辞：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希望由自己来投票决定自己的领导人和如何分配国家资源呢？但回到“全球社会”

理论，民主地理与人民的意愿关系不大，却高度关联于国家在全球经济核心—边缘等级制中的位置。因为民主选举在基层（基础）选民那里不可避免地还原为“市场的扩张”行为，选民通过出售选票以换取被允诺的实质开支抵押，从而使选举政治异化为接近国家资源和进行大尺度（政治性）再分配的手段。因此，选举政治本质上建立在跨国结构中：如果再分配只限于国家范畴，它就会经由高福利消耗的方式破坏自身的平衡，使自己无法维持下去。但是全球化带来一种可能，就是使一个国家的财政透过核心—边缘结构向边缘地区无限制透支；尤其是霸权国家，它的民主制度及其民众福利制度的开支，都以得到全世界的转移支付为前提，最终都要落实到它对世界所行使的战争权力。另一方面，被透支的边缘国家则失去了实质民主的